

文字学电子教案

黄天树 胡安顺 陈 枫

第一编 甲骨文、殷周金文、战国文字

序 言

古文字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字包括世界各国古文字，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在本土上经过很长时间孕育而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国的古文字。

我们这部书中所要讨论的古文字是狭义的。即中国的古文字。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古汉字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古文字。例如公元前有所谓“巴蜀文字”等。公元以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一些少数民族也创造和使用过不同类型的文字。不过，那些文字的出现都比汉字要晚得多，其时代最早的只能追溯到汉代，多数则是唐代以后才有的。历史上兄弟民族使用过的文字有很多种，例如纳西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蒙文、满文、回鹘文、西夏文等等不下几十种。以上这些兄弟民族在历史上使用过的文字，学术界一般称为“民族古文字”。研究这些文字的学问即称为“民族古文字学”。“古文字”这一名称虽然不如“古汉字”明确，容易引起误解，但这一名称古已有之，已为学术界所熟悉。

“古文字”一词，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最早见于汉代。班固《汉书·郊祀志》载“张敞好古文字”。古文字又称“古文”或“古字”。例如《说文·叙》：“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古文字的时代上限可以追溯到文字的萌芽时代，至于其下限应该划到哪个时期，学术界的意见尚不一致。多数学者以秦代统一文字时期作为下限，也就是说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指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

唐兰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小篆也算作古文字(齐鲁书社 1981 年版 31 至 32 页)。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好多秦代到汉初的简牍和帛书等文字材料。这些简帛上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的区别，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因此，李学勤认为：“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把汉武帝以前的文字包括在内。”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通过研究古文字的构造和演变规律以及释读古文字资料来揭示古代历史文化的奥秘。

“古文字学”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1934 年，他把授课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后来该书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1981 年由齐鲁书社再版)。这部书为古文字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古文字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今天，古文字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对古文字的分类及学科分支的划分已相当科学。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将古文字分成殷商系、西周系、六国系、秦系四个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一书中的分法与唐氏的分法相同，他们都是将小篆包括在秦系文字之中。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中将古文字学大体上分成四个分支，即甲骨学、殷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牍帛书研究。本书将古文字分成甲骨文、殷周金文、战国文字和《说文解字》四个部分进行介绍，其中《说文解字》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关于小篆的内容和研究概况。

关于怎样学习古文字有两篇文章值得参看，一篇是李学勤的《谈自学古文字》，《文史知识》1981年6期，另一篇是裘锡圭的《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第一章 甲骨文

第一节 殷墟甲骨文研究概况

一、甲骨文与甲骨学

1949年以前，出土甲骨文的地点，只有殷墟一处。因此很少有人将“甲骨文”这个名称上再加上“殷墟”二字。1949年以后，甲骨在其他地区也相继被发现。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少量商代甲骨文（《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5期）。接着，1954年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古遗址墓葬群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4期）、195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1975年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1988年在湖北省襄樊檀溪村（《西周有字卜骨在襄樊出土》，《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1991年在河北省邢台南小汪（《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1995—1996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等地也先后出土了一些周代甲骨文，不过数量一般都很少。只有在岐山、扶风两县间的周原遗址所出数量最多，仅岐山县凤雏一地就发现甲骨一万多片，其中有字甲骨近300片。这些甲骨上的文字一般都较少而且字体纤小，需放大5倍才能辨认（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因此，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其时间和范围都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指商代也包括周代刻（偶尔也有写的）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我们这部书中所要介绍的只限于殷墟甲骨文。

“殷墟”是商王朝晚期都城的遗址，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殷墟当时作为晚商都城，共经8代12王，历时253年。年代约当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

甲骨文的数量是以“片”来统计的。甲骨埋藏于地下，历经三千年之久，质地脆弱，出土后往往一版断为数片。到了古董商手中，又被分饷数家，不断流动转手，所以要精确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曾估计为10万片（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近年来，胡厚宣根据统计指出，目前全世界收藏的甲骨大约有15万片左右。若每片以10字计算，总字数已超过100万字。它大体上能够反映商代后期使用文字的情况（《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5期；《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

甲骨文不重复的单字大概有多少呢？于省吾指出：“截至现在为止，甲骨文不重复的字约四千五百多个，我们所认识的还超不过一千字。”（《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

1973年2期33页)

甲骨文的出现导致了一门学科的诞生，这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是何人何时首创的，据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一书所载，率先以“甲骨学”揭之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朱氏是王国维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了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出版了《甲骨学商史编》。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起来。甲骨学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甲骨学则包括以甲骨文为材料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们所讲的“甲骨学”单指前者。

二、甲骨学基础知识

甲骨主要是古代占卜的遗物。在殷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殷人遇到疑难的事情一定要求神问卦，烧灼龟甲或兽骨，令其表面出现兆象(裂纹)，以便据之预测吉凶祸福。这种巫术在中国起源甚早，在商代非常盛行。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占卜时所刻之辞，要通读卜辞，必须先了解有关甲骨的基础知识，知道卜法的程序等。李学勤曾著有《关于甲骨的基础知识》(《历史教学》1957年7期)一文，可以参看。殷代占卜所用的材料除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外，有时也用少量的羊、猪、鹿的肩胛骨。占卜之前，甲骨须先经过整治。其整治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锯削磨平。先将龟从腹甲和背甲之间的甲桥(龟腹甲中部之两边，有与背甲相连接的骨骼，因似自腹甲渡到背甲的桥梁，故学者称作甲桥)处锯开。对于锯下的腹甲，先削平甲桥，再将其刮磨平整。背甲则从中脊处一剖为二，再锯去首尾两端，使之成为鞋底形的“改制背甲”。对于牛胛骨，需要锯去突出的白角和背面凸起的胛冈。最后将甲骨正、反面打磨光滑。

第二步，制造“钻凿”。在龟甲的内面或骨的反面(原有胛冈的一面)，先用刀挖刻出长约一厘米的椭圆形凹槽，叫“凿”，再在其一侧用小圆钻钻出一个和椭圆形凹槽通连的圆形洼洞，叫“钻”。也有先钻一个圆形洼洞，再在圆形洼洞里挖“凿”，像猫眼形。加工好的甲骨成品，交付管理占卜的卜人保管，以备卜用。

第三步，灼兆刻辞。钻凿的目的是便于控制卜兆的走向。钻凿的排列是整齐有序的。钻凿之后，用暗火烧灼钻凿，被烤灼的甲骨因受热，其正面便出现裂纹，作卜、十诸形，这就是兆璽。见兆之后，一般由商王依据卜兆的形状来判断其吉凶，然后刻上卜辞。甲骨上的卜兆以在正面者居多，故卜辞亦多刻于正面。龟甲主要用腹甲，其背面钻凿是“左半(甲)向右，右半(甲)向左”。少量用背甲，背甲一般从中脊平分对剖，背甲上的内面钻凿也是“左半(甲)向右，右半(甲)向左”。胛骨一左一右为一对，其背面钻凿也是“左半(胛骨)向右，右半(胛骨)向左”。烧灼钻凿之后，龟腹甲、背甲、胛骨正面卜兆的走向也是“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刻写卜辞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是“迎兆刻辞”。龟腹甲右侧(左右是以人为基准)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侧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桥边缘部分，卜辞由外向内行。背甲与之相同。商人占卜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问疑，反映在龟甲上则有位置相应的左右“对贞”。

三、殷墟甲骨断代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文字。现在甲骨学界都认为甲骨文包含武丁至帝辛(即商纣王)各代卜辞。但是对于是否有盘庚、小辛、小乙这几个时代卜辞，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即使确认甲骨文的时代是自武丁开始，终于纣王，也已经历了八世十二王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如果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把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对于一片具体刻有文字的甲骨片来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知道这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的东西，还应该进一步辨明，它究竟是晚商二百多年中哪一个时期的。这种判断具体年代的工作，就叫做断代。用董作宾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每一块甲骨上所记的史实，

还它个原有的时代”。断代问题不解决，则十万片甲骨依然是一堆“断烂朝报”，缺少应有的科学价值。

王国维在 1917 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的文章中，首先用卜辞中的称谓与《史记·殷本纪》所载世系相对照来断定甲骨的年代，开启了甲骨断代的先河。而甲骨断代学说的创立，则要到 1935 年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才算真正发轫。

董氏据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字体把甲骨文分成以下五期：

第一期	盘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 祖甲	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廩辛 康丁	一世二王
第四期	武乙 文丁	二世二王
第五期	帝乙 帝辛	二世二王

董氏的五期断代学说把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科学价值，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但是，他的五期分法也存在着弊病，就是把甲骨本身的分类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五期断代学说把殷墟甲骨分为五大类。认为第一类的书写风格雄伟；第二类谨饬；第三类颓糜；第四类劲峭；第五类严整。然后机械地将其分别定在盘庚至武丁、祖庚与祖甲、廩辛与康丁、武乙与文丁、帝乙与帝辛五个时期。甲骨断代应以甲骨卜辞本身显示出来的特点为根据，既不能机械地把时代界线划在两王交替之际，也不能完全依靠贞人来断代。

随着殷墟发掘的继续进行，甲骨的出土不断增多。今天多数甲骨学者都逐渐认识到，所谓甲骨断代研究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甲骨分类以及确定每类甲骨所在的年代。“甲骨分类”是指根据字体等特征把殷墟甲骨划分为若干类，“确定年代”是指要确定每类甲骨处在什么王世。后者要对每类甲骨中所见到的全部称谓加以归纳，总结成“称谓系统”，再用这种“称谓系统”（祖、妣、父、母等）同商王世系进行对照以确定每类甲骨所处的年代。此外，诸如贞人、出土层位、人名事类等也是称谓系统之外的确定年代的原始依据。

五十年代初，陈梦家（1911—1966）在进行甲骨断代研究时，已经多少意识到董氏五期分法简单按王世划分甲骨的缺陷。因此，他在《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一文中使用了宾组、出组等名称，其方法主要是通过贞人（陈氏称为“卜人”）的系联来给甲骨分组（文见《中国考古学报》第 5 册，1951 年；后收入《综述》）。

70 年代以后，在讨论甲骨分期有关问题时，李学勤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 年 11 期）一文中提出“历组”的名称；后来又在《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 年 5 期）一文中提出了“无名组”的名称。所谓无名组是指由全无卜人的卜辞所归成的一组。在后一篇文章里，他认为殷墟卜辞主要可分为九组，即陈氏所分的宾组、自组、子组、午组、出组、何组、黄组，再加上他的历组和无名组。详见以下对照表：

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三家甲骨分期分组对照表

李学勤	董作宾	陈梦家
宾组	一期	宾组，武丁卜辞
自组	四期，文武丁卜辞	自组，武丁晚期
子组	四期，文武丁卜辞	子组
午组	四期，文武丁卜辞	午组
历组	四期	武文卜辞
出组	二期	出组，庚甲卜辞
无名组	三期	康丁卜辞

何组	三期	何组，廪辛卜辞
黄组	五期	乙辛卜辞

四、100 年来殷墟甲骨文研究概况

甲骨文发现于 1899 年，到现在已超过 100 年了。一百多年来，甲骨学研究共经历了它发展道路上的“先驱时期”（1899—1909）、“奠基时期”（1910—1928）、“形成时期”（1928—1937）、“低潮时期”（1937—1949）、“高潮时期”（1949—1966）、“停滞时期”（1966—1976）和“繁荣时期”等七个时期（1976—今），目前已成为一门成熟的重要学科。

（一）先驱时期（1899—1909）

19 世纪末，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耕地时，经常发现甲骨。村民把它看作是可作药用的“龙骨”卖给药店，于是这些龙骨被药材经纪商贩运到各地销售。

传说 1899 年（光绪 25 年），金石学家王懿荣（1845—1900）得了病，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是“龙骨”。王懿荣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结果意外地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文字。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价值连城，遂不惜巨资大量购求。经他“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汉章《古董录》，1933 年 10 月 10 日、15 日，《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50、51 期）。也有人说甲骨文是 1898 年天津王襄（1876—1965）、孟定生（1869—1941）首先发现的。不过，学术界一般信从前说（参看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载《殷都学刊》1984 年 4 期）。

王懿荣鉴定出甲骨上的文字是三代古文，功不可没。从此以后，甲骨文始为世人所知。1900 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氏投井，壮烈殉国。王氏死后，他生前所藏大部分甲骨为刘鹗（1857—1909）所得。刘鹗即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字铁云。

1903 年（光绪 29 年），刘鹗从自藏的甲骨中选拓 1058 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它的出版使甲骨由只供少数人观赏摩挲的古董变成了研究的资料，扩大了甲骨的流传范围，意义巨大。在此书出版的第二年，即 1904 年，孙诒让（1848—1908）花了两个月时间仔细研读《铁云藏龟》，写出了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开创性专著《契文举例》。

（二）奠基时期（1910—1928）

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在甲骨文的考释和通读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初步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

为了垄断甲骨的出售以牟取暴利，古董商故意对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加以隐瞒，所以早期的甲骨学者或以为甲骨出於汤阴，或以为出於卫辉。直到 1908 年，罗振玉经过多年留意探寻，才弄清楚甲骨的确切出土地是安阳小屯村。1910 年（宣统二年），罗振玉著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考定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甲骨文是殷商王朝占卜的遗物。这一推论，在甲骨研究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

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期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出版过《殷墟书契》（1913 年，后通称《前编》）、《殷墟书契菁华》（1914 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 年）等甲骨著录书。其中《殷墟书契考释》（1915 年）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

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对通读卜辞常具有重要意义。1917 年，王氏著成《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在甲骨文的考释书里这是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综合研究。特别是 1917 年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

《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均收入《观堂集林·卷九》），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的可靠性，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同时，他还根据《后上》8.14与《戠》1·10的缀合，发现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如此等等，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学术地位。

这一时期重要的外国学者有日本的林泰辅。他是日本搜集研究甲骨的第一人。他编纂的《龟甲兽骨文字》(1921)一书是日本学者编纂的第一部刊布甲骨文的著录书。另一位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他是继方法敛之后收藏和研究甲骨的最重要的西方学者。他于1917年出版的《殷虚卜辞》是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摹本著录书。由于外国在华人士热衷于购藏甲骨，使甲骨很快地流散到欧美、日本等地，并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甲骨学也随之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三) 形成时期(1929—1937)

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开始组织发掘殷墟。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之间，共发掘了15次。董作宾从第1次到第9次发掘所得的有字甲骨中选拓出3942号编为《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第10次到第12次主要是发掘殷代王陵，未出现有字甲骨。从第13次到第15次发掘所得的有字甲骨中，董作宾选拓出9105号编为《殷虚文字乙编》(1948—1953年)。

20年代末，郭沫若(1892—1978)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他的《卜辞通纂》(1933)和《殷契粹编》(1937)在卜辞的通读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不但撰写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卜辞考释著作，而且在他的一系列古史专著里大量引用了甲骨文史料，极大提高了古代史研究的水平。郭氏以后，运用甲骨文史料研究商代历史的学者数量越来越多，贡献较大者有胡厚宣(1911—1995)、张政烺、徐中舒(1898—1991)、吴其昌和丁山等人。

董作宾(1895—1963)是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对甲骨文进行了分斯断代研究。他根据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所创立的“五期”断代体系是以当时的考古成果为基础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有很多方面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所以为海内外学者普遍采用。

在30年代，古文字的研究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地加以总结。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天马行空”式的任凭其丰富的想象力去考释古文字。唐兰(1901—1979)针对这种精况，写了《古文字学导论》一书，力图把古文字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唐兰不仅在古文字研究的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建树，而且亲身实践，考释出很多难识之字。他是继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后在甲骨文释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殷虚文字记》(1934)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此外，容庚(1894—1983)等人的《殷契卜辞释文》(1933)、商承祚(1902—1991)的《殷契佚存考释》(1933)等书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著作。经过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的研究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甲骨学已正式形成。

(四) 低潮时期(1937—1949)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甲骨学的发展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处于低潮时期。抗战期间，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中，根据不同时期卜辞在历法、祭祀等制度上的特点，于分期之外又提出了所谓“旧派”和“新派”的分派学说。他从“新派”卜辞中整理出了商王按照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即“周祭”)制度。这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进作用。

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于省吾(1896—1984)在1940—1943年出版了《双剑謠殷契骈枝》初编、续编和三编，新识或纠正过去的误释字共100余字，为甲骨文的研究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

(五)高潮时期(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这一阶段是甲骨文研究的高潮时期。1951年，陈梦家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墟卜辞综述》)，以发掘坑位和卜辞系联等大量证据，论证董作宾所谓“文武丁卜辞”中的白组、子组等卜辞实属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之再检讨》一文得到了和陈氏大体相同的结论。

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这是关于殷墟卜辞研究成果的大型通论性著作。在已有的关于殷墟卜辞的通论性著作里，没有一部能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它相比。

李学勤(1933—)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他在《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7)一文中指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同一王世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一个王世。”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六)停滞时期(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是文革时期，这一时期国内的甲骨文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发表的论著很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裘锡圭(1935—)的《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1972)、张政烺的《卜辞袁田及其相关诸问题》(1973)等。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发现刻辞甲骨5041片，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考古所将全部卜辞拓本4589号汇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80—1983年出版。该书属继《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资料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67年，日本学者岛邦男出版了《殷墟卜辞综类》，这是一部创造性的大型甲骨卜辞辞例索引工具书。每个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样摹出含有这个字的所有卜辞(极常用的字除外)，对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极有实用价值。

(七)繁荣时期(1976—今)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现在，甲骨文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名家辈出，论著如林，李学勤和裘锡圭是这一时期杰出的学术带头人。

自1978至1982年，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13册陆续出齐。这部由郭沫若任主编的巨书共收录甲骨41956片，甲骨资料中有研究价值的部分基本上搜罗在内。《合集》未及收入的甲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7巨册，于199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索引》及《材料来源表》也于1999年出版。《合集》问世以后，又有若干著录书出版。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松丸道雄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李学勤等的《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雷焕章的《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1997)、胡厚宣的《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和《甲骨续存补编》(1996)、李学勤等的《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999)等。此外，199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花园庄东地H3发现有字甲骨579片，这批内容重要的甲骨目前尚在整理之中。

《合集》及其后各种著录书的相继出版，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1989年姚孝遂等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即弥补了《殷墟卜辞综类》所收资料仅限于70年代以前且无隶释的缺陷，这无疑是今后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工具书。结集各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为完备的是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

关于整理工作，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现已出版四册，内容包括先公、先王、先妣、贞人(1989)、地名(1992)、天象(1993)和田猎(1995)等。这套工具书对今后深入进行甲骨文的专题性研究极有裨益。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於曾毅公 1939 年出版的《甲骨彙存》，该书於 1950 年扩大为《甲骨缀合编》。专就史语所发掘所获甲骨进行缀合工作的有郭若愚等的《殷虚文字缀合》(1995)、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1959—1972)。70 年代以后，又有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1975)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976)先后出版。近年来，甲骨缀合专文发表不少，其中以蔡哲茂的缀合成绩最大，其成果汇编为专书《甲骨缀合集》，於 1999 年出版。

殷墟甲骨断代是甲骨学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60 年代以来，李学勤读了陆续公布的殷墟发掘报告后，认定自组等必须列入早期。然而，自组等与所谓第四期的历组卜辞的联系又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李先生经过多年的思索，直到 1977 年，才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在《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提出历组卜辞实际上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的卜辞。此说后来得到裘锡圭、林澧等人的支持，1973 年小屯南地的发掘又进一步刺激了这项讨论。使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与方法的检讨。在检讨中，多数学者逐渐认识到必须把甲骨分类跟甲骨断代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这是甲骨断代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进展，由此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甲骨断代的新进展，可参看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1991)、李学勤、彭裕商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1996)。

释字是最主要的基础工作。在早期的研究者中间，贡献最大的是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罗、王以后释字最有成就的是唐兰和于省吾，当代则是裘锡圭等。1979 年，于省吾总结了 40 多年来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删订旧作《殷契骈枝》三编，与新释合为一编，题名《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出版。裘锡圭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创获尤多，其成果大多收入《古文字论集》等书中。

研究甲骨文语法的著作，早期有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和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文法》(1956)等。80 年代以后，国内唐钰明著有《定量和变换——古文字资料词汇语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沈培著有《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及《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1992)；张玉金著有《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国外学者司礼义、高岛谦一、倪德卫等也有论著，他们都在甲骨语法方面有所贡献。

研究甲骨文的通论性专著有严一萍的《甲骨学》(1978)、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美国学者吉德炜的《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刻辞》(1978)、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1999)等，其中《甲骨学一百年》一书是对 1899—1999 年百年甲骨学的全面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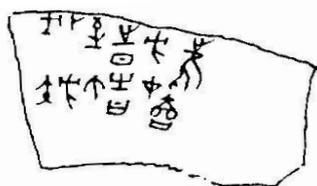
研究甲骨论著书目的著作五十年代有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52)，这一时期有宋镇豪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该书搜集到 1899 至 1999 年 6 月一百年间海内外所有公开出版、发表的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史的专书论文，不加检选，全部收录。

关于甲骨文研究概况的著作目前主要有裘锡圭的《古文字学简史》(《文史丛稿》第 139—157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和李学勤的《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 年 1 期)等。

第二节 殷墟甲骨文选读

第一片^①

戊寅卜	至不之日	出日方才	崔固
方			



第一片 合 20485

戊寅卜^②：方至^③？不^④。之日出(有)曰^⑤：“方才(在)隹畷(鄙)^⑥。”

【注释】

①本片是白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 20485 片。

②戊寅：干支纪日，即戊寅日。 卜：占卜。

③方：方国。卜辞称“方”者大多是商的敌人，如土方、鬼方等。这里指敌方。至：甲骨文作，象 (矢)射到一个地方，以此表示“到”的意思。据此可见《说文》认为“至”字象“鸟飞从高下至地”的解释是错误的。“至”在这里当“至於商之近畿”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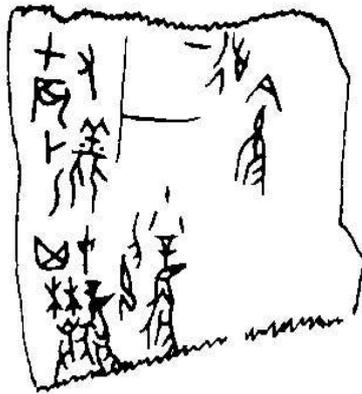
④不：验辞，意即不至。“不至”当指没有到达商之近畿。

⑤之：指示代词。“之日”指过去的戊寅日。 出：卜辞习见，据上下文义，在此读为有。 曰：甲骨文作，象人嘴出声气。这里义为报告。

⑥隹：地名。 畷 (畷)：是“鄙”的古字，指城邑四周的农业区。古代称都邑四周的土地为鄙，鄙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字形在象都邑形的“口”上加“商” (仓廩之“廩”的初文)以示意。

全辞大意：戊寅日占卜，问敌方会不会到商的近畿来骚扰？验辞说：敌方没有到达商之近畿来骚扰。戊寅日有人报告敌方在隹地之鄙。

第二片^①



甲辰卜 乙其燕

又(有)中凤抑小

凤征霍

第二片 合 20769

甲辰卜：乙其燕^②，又(有)中凤(风)抑^③？小凤(风)，征(延)霍(陰)

④。

【注释】

①本片是白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 20769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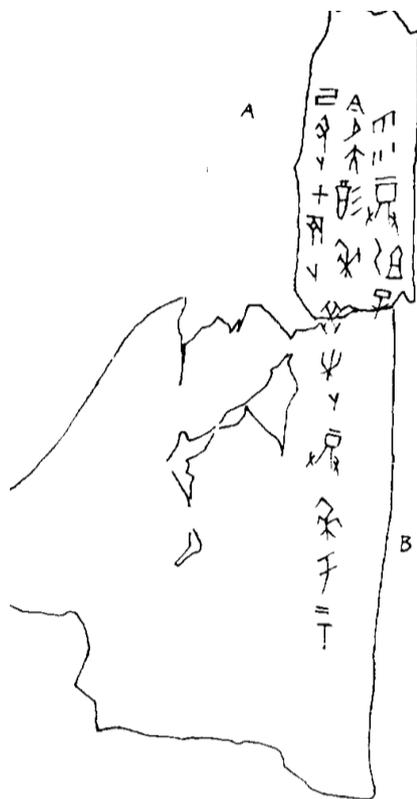
②燕：旧释“焚”，焚林而田，烧毁树林以猎取野兽。姚孝遂等认为卜辞“焚”字作，与字形及用法都有区别。应释为“燕”字。《说文》：“燕，烧也。”甲文“燕”字象执火炬以驱赶野兽而加以围捕，是一种大规模的围猎形式。

③凤：不识。 凤：即古凤字，象高冠美丽的凤鸟。甲骨文假借凤为风。 抑：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释作“抑”字古体(《说文》“从反印”)，并指出“印”、“抑”古本一字，这是正确的。李学勤、裘锡圭认为在此当句末疑问语气词讲。

④征：即延字。 甲骨文霍字。从隹，今声，通陰晴之陰。

全辞大意：甲辰日占卜，问第二天乙巳执火炬驱赶野兽而加以围捕时，有中
风吗？验辞记载说：乙巳这一天有小风，继续阴天。

第三片^①



己丑卜 今夕大雨
甲辰卜 酒黍登祖乙子
癸未卜 登黍于二示

第三片 合 27219 + 34107

癸未卜：登黍于二示^②？
甲辰卜：酒黍登（登）祖乙子（巳）^③？
己丑卜：今夕大雨^④？

【注释】

①本片是自组历间类，选自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第 706 片，由《甲骨文合集》第 27219 片和第 34107 片缀合而成。

②登：甲骨文作。从“歺”从“豆”，可隶作，象两手捧着一种叫做“豆”的盛食器皿。“登”字在典籍里多写作“登”。《礼记·月令》：“农乃登黍”，郑玄注：“登，进也。”表示向祖先的神主进献新打下的黍稷。于：介词，向。二示：甲骨文“示”字较原始的写法作，象神主的牌位。“二示”是专指两位祖先“示壬”和“示癸”；或泛指两位祖先。

③祖乙：殷先王名。祖乙子（巳）：应该读为“祖乙乙巳”。乙巳是祭祀的日子，在卜辞里时间词后置之例很常见，例如：“祖乙未”（合 32504）、“祖乙亥”（合 32072）等。殷墟卜辞中地支“巳”字写作，而地支“子”字写作，二者写法不同。

④夕：指夜晚。

这版卜骨上刻有三条卜辞，应该由下往上读。卜辞大意：癸未日占卜，问向二位祖先的神主进献新打下的黍稷好不好？甲辰日占卜，问在乙巳那一天向祖乙献黍稷时举行酒祭好不好？己丑日占卜，问今天夜间会不会下大雨？

第四片^①



第四片 合2131

父	父	父
辛	庚	甲
一	一	一
𠄎	𠄎	𠄎

父甲一𠄎？
父庚一𠄎？
父辛一𠄎^②？

【注释】

①本片是宾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2131片

②父：在殷代，伯父、叔父皆可称父。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祖某父某兄某”条据本片甲骨有“父甲、父庚、父辛”而判定其年代。王氏说：“此当为武丁时所卜，父甲、父庚、父辛即阳甲、盘庚、小辛，皆小乙之兄而武丁之诸父也。”这种推断是很正确的。𠄎：从羊从士，可隶作𠄎，义为公羊。此字《说文》无，《说文》中的“牡”字义为“公牛”。后世通牡为畜父之称，而𠄎字不再使用了。

这版卜骨上刻有三条卜辞，应该由右往左读。卜辞大意：用一头公羊作为祭品来祭祀伯父阳甲、盘庚、小辛，合适吗？

第五片^①



第五片 合643

癸子卜	牽	牽	亥既牽
賓鼎臣	王占曰吉其	佳乙丁七日丁	

癸子(巳)卜賓鼎(貞)^②：臣牽(執)^③？王占曰^④：“吉，其牽(執)佳(唯)乙、

丁^⑤。”七日丁亥既牵(執)^⑥。

【注释】

①本片是宾组，选自《甲骨文合集》第643片。

②宾：贞人名。𠄎：即“鼎”字。商代文字有正体和俗体。甲骨文是当时的一种俗体字，而金文是当时的正体字。“鼎”字由𠄎简化为𠄎。古音“鼎”在端纽耕部，“贞”也在端纽耕部，二字声韵全同，所以甲骨文借“鼎”为“贞”。《说文》：“贞，卜问也。”

③臣：甲骨文作𠄎。《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郭沫若认为：“𠄎均象一竖目之形，人俯首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臣在这里当“臣奴”讲。𠄎：隶作牵，后世不见单用，只见於“执”、“圉”等字的偏旁。从甲骨文“执”字分析，𠄎象施於手腕的械形，类似今之手铐。《说文》保存有此字，曰：“幸，所以惊人也。”牵字，在这里是动词，可读作“执”，当“捕获”、“抓住”讲。

④𠄎：即《说文》“占”字，指察看卜兆后作出判断。

⑤佳：象鸟形，在这里借作虚词“唯”。乙：乙未之省。丁：丁酉之省。

⑥既：即“既”字。甲骨文字形表示饮食完毕，所以人形上端的竖“口”不向食物而向身后。在这里是“已经”的意思。

这是一条较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全辞大意：癸巳日占卜，由贞人“宾”主持贞问，问逃亡的臣奴能否抓住？商王武丁察看了卜兆后作出判断，说：“吉利，到第三天的乙未或第五天的丁酉就会把臣奴抓住。”但是，商王武丁所占不准确，事实上在癸巳日占卜的七天前的丁亥日，臣奴就早已在某地被抓住了。

二〇〇二年九月